

中华民国后半期(1928-1949)政治史研究综述

——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今后的课题——

水羽信男

序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止,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以肯定1949年革命为前提的。他们规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革命斗争,认为1949年革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之胜利,并力图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是这一胜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一研究立场,随着日本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态度的确立而被开始重新审视(*1)。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前期开始,学界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对经济史的关注也高涨起来,继而社会史也得到了重视。就本稿所要介绍的政治史研究领域而言,被关注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史或人民斗争史,研究者对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等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势力也开始加以关注。超越以往的革命或是反革命的二分法,从整体上理解中国近代史,成为新的潮流。

这一潮流至20世纪80年代,被统称为中华民国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和正史意义上的断代史研究是不同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把中华民国同明清时期的延续或非延续的关系当作其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把用历史学的眼光去理解现代中国作为目的[野澤豊 1995]。根据笔者个人的看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基本线索”,被研究者理解成为以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为动力的建立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过程。

下面，笔者就以中华民国后期(1928年至1949年)的政治史为中心，对日本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及课题作一综述。具体而言，第一部分：概述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简单概述对1928年以后的各种政治势力的研究状况。最后，介绍新的研究动向与课题。本文之所以把1928年作为起点，既有篇幅上的关系，也是因为笔者注意到：这一年，国民党大致完成了“北伐”，总算实现了国家统一，基本上形成了中央政府领导国家建设的条件。

一、研究政治史的理论框架

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实证研究方面。它不单引用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档案史料，同时还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在日本、欧美的史料，既细致又周到。但这并不是其唯一的特征。用理论性的方法来作分析是它的另一个特征。下面笔者就把与中华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基本线索”相关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的论说作一介绍。

1.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日本学界认为民族主义支撑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为了解民族主义的真实面貌，而加深了相关研究，其中弄清了民族主义的以下两个特征[丸山真男1964等]：

第一，民族情感最初的表现具有排外主义的色彩，它本来是冲动的、无定型的。

第二，所以，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需要通过某种政治势力来加以

组织和定向。而这一政治势力的政治指导将决定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的作用，既有可能是“民主的”，也有可能是“反民主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战败后的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得以战胜日本的原因之一，高度评价其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主义的组织工作及引导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了新的认识。即国民党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中坚，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为抗战的力量而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日本研究者认识抗日的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这种新的认识的背后有着这样一个真挚的反思：为了全面认清侵略战争的问题，日本人虽身处侵略者一方，却轻而易举地站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一方去批判国民党(反革命)，而仅有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全貌的。

此外，近年来民族主义组织化结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对民族主义所固有的非民主性乃至反民主性的关注高涨起来。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美国 2002 年 9 月 11 日以后的一段时期，便可得到生动的印象。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在美国难以进行公开反战，只有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政府对其所认定的恐怖主义支援国的军事进攻，才被认为是爱国的；而主张反战就与拥护恐怖主义同罪。

这样，权力往往给国内的敌对势力贴上“里通外国”的“内奸”的标签。并通过攻击和排挤他们，来煽动大众的排外性的民族情感借以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在个人自由等方面受到显著制约的反(非)民主统治则被合法化和强化。这是不可否认的。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认真反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战争行

为的同时，普遍地论述学习抗日民族主义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认为反思抗日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今井駿 1997：238]。譬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虽然有效地抵抗了侵略，并促进了民主主义的扎根，但既然是民族主义，其固有的排外主义倾向也就在所难免。即“有光必有影”。举例来说，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在同揭发特务运动等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内的民主主义问题上，需要重新探讨的一些课题[丸田孝志 1993]。

当然，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肯定民族主义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比如，有人就主张：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经民族主义向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不少参加民盟的知识分子加入 1949 年革命的行列，正是由于民族主义这一杠杆的作用[平野正 1983/1987 等]。

如下文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正视民族主义的反民主乃至非民主的一面，同时应该承认权力常常利用媒体来煽动民族主义情感的一面。对笔者的这一观点，平野正提出了批评[平野正 2000]。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通过培养理性来扼止民族主义非理性冲动的一面，那么民族主义也许会成为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展望民族主义能成为民主化的动力(*2)。

2. 国民国家 (Nation-State)

就象过去普遍认为人民民主主义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为进步一样，人民主权曾意味着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从而昭示人类应有的政治体系。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分析历史过程的时候，国民国家概念比前者更有效性。

因为运用国民国家论可以从一个长的时间跨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特征，

而民族主义正是贯穿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基本历史推动力。过去的研究往往只强调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但是如果站在国民国家论的立场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国共两党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共同面。而且，立足于国民国家这一共有的视角，也可以提供将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线索[西村成雄 1991/2004、横山宏章 1996]。

关于国民国家概念，以下的定义具有代表性。

它是被国境线划分成一定范围的、具有主权的国家。而且居住在那里的人(Nation=国民)，共有国民一体感(National Identity=民族认同感)[木畑洋一 1994:5]。

众所周知，为了国民国家的形成，国家利用权力自上而下地强行瓦解地方主义和身分制度等，以创造培养“均一”的“国民”的条件。它还利用学校和军队等机构对人们实施“国民”教育，并利用报纸、杂志等宣传工具(它们使用标准的白话文)来灌输“国民”意识。这样就促使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主动地把自己同国家一体化。而且，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只被单方面地要求忠诚和服从的“国民”，是很难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对国家的认同的[村田雄二郎 2000]。

国家机构即使仅仅为了获得眼前利益，也有必要同旧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并花费时间来教育人们。所以，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需要数十年时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可以说，“国民”的认同感经常处于动摇的危险境地，国家机构不得不要经常对其进行再铸造。即使在日本，从德川幕府瓦解到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帝国议会的召开，国民国家的大致形成也花费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后，为了提高爱国心，国家还反复发动了思想、政治运动。

现在，日本学界从国民国家史研究的角度对创造“国民”之手段的研究也有了进展，近代中国的教育史[新保敦子 2003等]、国语制定史[村田雄二

郎 1995 等]、媒介形成史[贵志俊彦 2003 等]均受到关注。此外,把 1949 年革命当作中国国民国家建设的一个阶段加以考虑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如前所述,研究者愈加强调,不应把中华民国史当作断代史来看待,而应对 1949 年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进行分析[久保亨 2003 等]。

二、 日本研究民国后期(1928--49)政治史的成就

中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并不是对种种政治事件的“年表”式的堆砌。下面,笔者将就日本对 1928 年以后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产党的研究状况作逐一介绍。其中,①国民党·国民政府是“民族主义”组织化与国民国家体系的创始者,②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则是以树立不同于现有“国民政府”的国民国家为目标的集团,③共产党则以打倒现有“国民政府”为目标,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3)。

1. 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研究

可以说,在日本,中华民国史研究是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研究的深入而全面启动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 1986]。这恐怕是基于对如下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在中国,建立国民国家的进程,就是靠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真正启动的。此种认识也是建筑在对过去以中共党史研究代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态度的反思之上的。

随着这方面研究取得进展,过去的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遭到了摒弃。而新的立论主张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在资本主义化和政治近代化方面还是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点随着实证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越来越明朗化[久保亨 1982/1995a/1995b、奥村哲 1990等]。现在的日本学界已基本上不采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名词。

现今在日本学界有如下一个普遍的认识。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东亚政治史的核心，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加入到国民国家体系，推动了“国民”的形成以及国家的整合，在建设国民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4)。

具体而言，首先，在围绕抗日战略的问题上，过去曾被漠视的国民党理论家们的言论成为研究对象。新的研究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也有爱国的抗日战略，即使其具有反共性质。国民党并不是在共产党或者是救国会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而是主动适应西安事变等环境条件的变化，自主选择向抗日方向转变的[今井駿 1997]。

其次，在经济、社会方面，研究者论证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币制改革获得成功，替代进口的工业化有了进展，重工业建设也在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下进入了实施阶段[野澤豊 1981、石川禎浩 1991、久保亨 1995b等]。同时，在围绕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研究者使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的史料，证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华盛顿体制这一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通过主体性的外交努力取得了具体性成果[久保亨 1999]。

除了上述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方面的研究以外，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比如，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和创造自耕农的尝试得到分析，并确认国民党拥有取代共产党土地革命的方案[笹川裕史 2002]。另外，国民政府的农业改良政策也逐渐得到诠释[弁納才一 2003/2004]。

此外，受国民党在台湾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事态的影响，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民主化进程受到了瞩目。虽说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是若从

国民国家的角度来看，它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课题。这一方面的具体成果主要集中在抗战胜利后的立法院[金子肇 2001]、以及从抗战时期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言论政策等思想、文化政策方面的研究[中村元哉 2004]。

再有，从时间上来讲，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庆国民政府[菊池一隆 2002、石島紀之 2004b]、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姬田光義 2001]，以及国民革命时期[野澤豊 1974、狭間直樹 1992、坂野良吉 2004]也得到关注。同时关于国民党的各个领导人，研究者也超越了“善恶论”，不单对蒋介石，且对张学良等也予以关注，使用以往未发现史料进行的相关研究已正式启动[野村浩一 1997、家近亮子 2002、西村成雄 1996]。

2. 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追求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始于国民党，成于共产党。就算这一过程对中国的国民国家的形成来说是合理之路，也不能因而抹杀追求其他可能性的另一部分人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在国民党独裁政治的崩溃、国民政府被打倒的过程中曾经发挥极大作用的正是被称为民主党派的一群知识分子。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了挖掘这一事实的工作[平野正 1977b/1983/1987、菊池貴晴 1987 等]。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命题在当时日本学术界占绝对优势。平野等人的工作意味着对这样的命题的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思想以都市为其立论的基础。但是，实际的中国革命研究在当时只重视农民的作用，而对都市诸要素没有进行过充分的研讨。

新的关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研究，首先通过对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一股重要力量，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活动的分析，明确了其思想的核心部分有追求中国民主化的内容。研究还阐明了抗战开始后各界

知识分子趋于统一，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并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挥重大作用，最终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占据一席之地等过程。

新的研究加深了对以城市为起源的中国民主主义运动史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平野正和笔者之间展开了学术讨论。其讨论的焦点是：①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救国会运动中的作用，②关于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的可能性问题。平野正高度评价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对笔者进行批判[平野正 1988 / 2000]。笔者则重视知识分子的自律性，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就在于能够纠正国家权力的错误和弥补不足，对平野正予以回应。讨论到目前还在进行中，虽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讨论所取得的成果可归纳为如下三点[水羽信男 1998]：

第一：对于20世纪30年代在白区的“共产党的领导”的认识，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白区的共产党组织，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联络极其困难，而且又面临国民党的恐怖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白区的共产党员在处理问题时，经常不得不作出独自的判断。也就是说，“党的领导”虽互相关联，但是在不同的局面下进行的。有必要作如下的区分而予以理解：**a)**陕北的党中央的领导，**b)**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c)**白区地下党的领导，**d)**各党员依据个人判断对周围进行的领导。

第二：所谓共产党的指导，既不以指导者一方的绝对正确性为前提，也不以强制为手段，且没有无视被指导一方的主体性。正如救国会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章乃器回忆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在逐步赢得民主派人士信赖的过程中得到贯彻的。

第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间派”的主张如下：民主主义是实现“人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人人能够达成做人的目的”的手段，国家又是实现民主主义的工具。应该说，在中国，他们是一群把平等保障自由作为目标的自由主义者，而这种自由是以个人的尊严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自

由主义者，未必意味着绝对选择资本主义体制的人。

另外，对各个知识分子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日本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特征，便是对章士钊[鑑屋一 2002]、章乃器[平野正 1977a、水羽信男 1997]、施复亮[水羽信男 1994、石川禎浩 2001]、罗隆基[湯本国穗 1992/1993、水羽信男 1995]等过去在中国未被充分研究的一批人的关注(*5)。如果我们能把这批人的思想倾向用“容共的自由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说日本对容共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正取得进展也并不为过。

3. 中共党史研究

新的研究动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构成要素(它被相对化)，它在变革中国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可能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来包罗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新的研究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为20世纪东亚层次上的思想交流的一个成果，研究者没有把党史单放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来考虑，而是把它当作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来看待，从而达到加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目的[石川禎浩 2001]。

在日本学界，对过去正统党史所批判的王明[田中仁 1996]、张国焘[田中仁 2002]，以及陈独秀等托派人物的研究[緒形康 1995、齊藤哲郎 1998]也取得了进展。这些研究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的深化，即仅仅理解正统的党史是无法全面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广度与可能性的。它与在东欧苏联的崩溃造成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形势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新可能性的动向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重新检讨也已开始。比如，对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予以真实的分析，研究者论证了农村党支部的“散慢”的现实情况与共产主义理论的脱节[高橋伸夫 2000]。此外，有研究者阐述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经过清算汉奸的斗争等，实质上成了一个变相的土地改革和农村革命[田中恭子 1996]。还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党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便决定采取扩大根据地路线，并不惜破坏统一战线[三好章 2003]。

按照这样的立场，历来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了共产党争取舆论的手段。从这种意义上看，田中恭子和三好章的立论，极具争议性。这种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还在增加。

但是，在日本，也有不同于上述议论的主张，它要重新认识作为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根源之一的统一战线的历史重要性[田中仁 2002]。正如国民党·国民政府史研究所表明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组织化的进展，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给共产党带来的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弄清共产党是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的，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可以说，以共产党曾面临的困难与危机为前提来论证，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会更加明确。

三、今后的课题

以上，笔者着眼于政治史介绍了日本的研究状况。说实在的，所谓政治史，是同阶级斗争史、革命史、运动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有关联的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而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对以国家论、制度论为基础的权力进行分析，并阐明其统治结构[金子肇 2003]。

也可以说，在政治史研究领域，需要确立“政策过程”研究的方法。具体地说，它既分析政策决定的过程，又分析政策推行的过程，同时把在这一政策推行过程所产生的制定新政策的必要性，也纳入到考察对象里。近年来，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也开始尝试全面地把握这一系列的“政策过程”

[Workshop “1930-1940 年代中国の政治过程” 事務局編 2004]。

不过，迄今为止，多数研究都着眼于城市的工业化，宪政运动等，关于农村、农业问题的研究较少。但是，中国大半人口住在农村，并以务农为其谋生的手段。因此，要想具体把握中国政治的进程，就不能忽视农村及农业问题。包含着“政策过程”的政治史研究，在中国绝对要立足于农村这一层次加以理解，如何将其理论化是今后必须面对的课题[奥村哲2003]。

日本学界围绕这一课题展开的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讨论是，在中国农村有没有“共同体”的问题。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即使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日战争时期，征兵征粮工作也极其困难之事实[笹川裕史 2002/2004]。

不仅是征粮问题，中国的现实与日本有很大的差异。在日本，不要提征粮了，就算是征兵，一张“征兵令”，就可以把大部分国民作为士兵动员起来。因为“共同体”内部的向心力不允许其成员拒绝包括征兵在内的、来自国家的要求。“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向心力作为支撑日本的近代化的“国民”凝聚力的历史性因素，其根深蒂固的牢固性得到了学界的重视[足立啓二 1998]。总的来说，否定中国存在“共同体”的主张还是占主流的[奥村哲 2003、三品英憲 2003、深町英夫 2003a/2003b]。

当然，也有重视中国内部之“共同关系”的主张[内山雅生 2003]。近年来，有些研究者认为在华北，县以下级别的集市里存在着“支付共同体”，八路军的活动就是靠它们才得以顺利进行。华北农村社会与“满洲”不同，日本在“满洲”通过控制县城内一集中型“共同体”的领导人就可以统治到社会的末端[安富步·福井千衣 2003]。

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今后还需要实证的和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中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看法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因为对他们来说，如何理解中国农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他们进行了真挚的讨论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实践[佐々木衛 2003]。

过去的研究，忽略了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对农村的理解，今后有必要对 20 世纪 30, 40 年代中国社会学的成果等方面进行个别研究。

最后，笔者将超越中华民国史的断代史的框架，提出今后具体的研究课题，以此来结束本文。首先，要阐明清末到中华民国前半期的政治史研究的关连性问题时，我们需要研究民国政治能否克服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即地方的自立性很强，中央不能以强权来统治这些地方势力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清末以来，对于当时的中央来说，如何树立与近代国家体制相适应的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成为了其最大的政治课题[横山英 1985、金子肇 1999、曾田三郎 2000]。

事实上，诸民主党派的建国方案中就有制定省宪与民选省长的要求。抗战时期，他们曾积极提出过这个要求。然后，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的过程中，民主党派也坚持地方自治的目标，一直到最后才放弃(*6)。政治史研究，往往集中于中央的国家权力。但是，要想把政治史作为综合史加以把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课题。

还有，中国拥有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广大领土。所以，立足于地域，具体研究其政治过程，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政治史，也是重要的。这样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在分析中日关系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中，有把研究目光放在华北的，也有把它放在云南省的[安井三吉 1993/2003，石島紀之 2004a](*7)。

最后，就象本文在上面已反复提出过的一样，为了超越断代史意义上的框架，考虑中华民国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它不仅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也需要理论上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围绕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理解进行讨论。

关于这一点，有人提出：所谓社会主义体制，是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所抉择的总体战体制，它的特征是，一党专政；生产资料的国家公有制；计

划经济；强制性的、由上而下的社会整合等。照这种立场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为抵抗日本（后来是美国）的侵略，由国民党发起，最后由共产党来完成的一个总体战体制[奥村哲 1999]。

虽然社会主义不是能轻易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有必要不断探讨下去。

注

- 1) 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对中国印象的变迁的情况，可参阅：[平野正2003]。
- 2) 详细内容可参阅：水羽信男「上海のマスメディア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姫田光義 2001]。
- 3) 关于日本中华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的介绍，可参阅：[山田辰雄 2002]。
- 4) 关于东亚政治史，可参阅：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研究の可能性」『歴史学研究』779、2003年。
- 5) 此外，还可参阅以下拙稿：「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愛国』と『民主』」『現代中国』65号、1991年、「1940年代後半期における中国民主派知識人の国家統合をめぐる論調」[横山英・曾田三郎 1992]。「羅隆基にみる中国近代知識人像」[池田誠等 1996]、「施復亮」[曾田三郎 1997]、「ある中国共産党員と大正期の東京」[曾田三郎 2001]。
- 6) 关于民主党派的地方自治论，可参阅：水羽信男「都市知識人と革命」『近きに在りて』30、1996年。
- 7) 把研究目光限定在地域来重新把握中华民国史的倾向，也为小浜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2000年、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等城市史研究领域所共有，这里不再一一提及。可参阅：吉澤誠一郎「中華民国史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の探究」『歴史学研究』779、2003年等。

【参考文献】

- 足立啓二（1998）『専制国家史論』柏書房。
- 鏡屋一（2002）『章士釗と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芙蓉書房出版。
- 家近亮子（2002）『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 池田誠等（1996）『中国近代化の歴史と展望』法律文化社。
- 石川禎浩（1991）「南京政府時期の技術官僚の形成と発展」『史林』74-2。
- 石川禎浩（2001）『中国共産党成立史』岩波書店。
- 石島紀之（2004a）『雲南と近代中国』青木書店。
- 石島紀之（2004b）『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近刊。
- 今井駿（1997）『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汲古書院。
- 内山雅生（2003）『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御茶の水書房。

- 緒形康 (1995) 『危機のディスカール』新評論。
- 奥村哲 (1990) 「旧中国資本主義論の基礎概念について」中国史研究会編『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統合』文理閣。
- 奥村哲 (1999) 『中国の現代史』青木書店。
- 奥村哲 (2003) 「民国期中国の農村社会の変容」『歴史学研究』779。
- 金子肇 (1999) 「袁世凱政権の地方財政機構改革」『歴史学研究』723。
- 金子肇 (2001) 「戦後の憲政実施と立法院改革」姫田光義 [2001]。
- 金子肇 (2003) 「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と文書史料」『史学研究』240。
- 菊池一隆 (2002) 『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
- 菊池貴晴 (1987) 『中国第三勢力史論』汲古書院。
- 貴志俊彦 (2003) 「国民政府による電化教育政策と抗日ナショナリズム」『東洋史研究』62-2。
- 木畑洋一 (1994) 「世界史の構造と国民国家」歴史学研究会編『国民国家を問う』青木書店。
- 久保亨 (1982) 「戦間期中国経済史の研究視角をめぐって」『歴史学研究』506。
- 久保亨 (1995a) 「世界史における民国時代」[野澤豊 1995]。
- 久保亨 (1995b) 『中国経済100年のあゆみ』(第二版) 創研出版。
- 久保亨 (1999) 『戦間期中国〈自律への模索〉』東京大学出版会。
- 久保亨 (2003) 「今日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歴史学研究』779。
- 齊藤哲郎 (1998) 『中国革命と知識人』研文出版。
- 笹川裕史 (2002) 『中華民国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汲古書院。
- 笹川裕史 (2004) 「糧食と兵士の徴発」[石島紀之 2004b]。
- 佐々木衛 (2003) 『費孝通』東信堂。
- 新保敦子 (2003) 「中国民国時期 (1912-1949年) における国家統合と社会教育の研究」『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12。
- 曾田三郎編 (1997) 『中国近代化過程の指導者たち』東方書店。
- 曾田三郎 (2000) 「政治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地方行政制度の革新」[西村成雄 2000]。
- 曾田三郎編 (2001) 『近代中国と日本』御茶の水書房。
- 高橋伸夫 (2000) 「根拠地における党と農民」(1) (2) 『法学研究』73-3・4。
- 田中恭子 (1996) 『土地と権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田中仁編著 (1996) 『王明著作目録』汲古書院。
- 田中仁 (2002) 『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勁草書房。
- 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 (1986) 『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汲古書院。
- 中村元哉 (2004) 『戦後中国の憲政実施と言論の自由1945-49』東京大学出版会。
- 西村成雄 (1991) 『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研文出版。
- 西村成雄 (1996) 『張学良』岩波書店。
- 西村成雄編 (2000)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巻3、東京大学出版会。
- 西村成雄 (2004) 『20世紀中国の政治空間』青木書店。
- 野澤豊編 (1974) 『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青木書店
- 野澤豊編 (1981) 『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
- 野澤豊編 (1995) 『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

- 野村浩一（1997）『蒋介石と毛沢東』岩波書店。
- 狭間直樹（1992）『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坂野良吉（2004）『中国国民革命政治過程の研究』校倉書房。
- 姫田光義編（2001）『戦後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
- 平野正（1977a）「1930年代における章乃器の思想その政治的立場」『西南学院大学文理論集』18-1。
- 平野正（1977b）『中国革命の知識人』日中出版社。
- 平野正（1983）『中国民主同盟の研究』研文出版。
- 平野正（1987）『中国の知識人と民主主義思想』研文出版。
- 平野正（1988）『北京一二・九学生運動』研文出版。
- 平野正（2000）『中国革命と中間路線問題』研文出版。
- 平野正（2003）『中国民主化運動の歩み』汲古書院。
- 深町英夫（2003a）「理論・概念・模式」『歴史評論』638。
- 深町英夫（2003b）『近代広東の政党、社会、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弁納才一（2003）『近代中国農村経済史の研究』金沢大学経済学部。
- 弁納才一（2004）『華中農村経済と近代化』汲古書院。
- 丸田孝志（1993）「抗日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鋤奸政策」『史学研究』199。
- 丸山真男（1964）『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
- 三品英憲（2003）「近現代華北農村社会史研究についての覚書」『史潮』新54。
- 水羽信男（1994）「施復亮の『中間派』論とその批判をめぐって」今永清二編『アジアの地域と社会』勁草書房。
- 水羽信男（1995）『満洲事変』前夜（1928～1931年）における羅隆基の『国民』像』『史学研究』208。
- 水羽信男（1997）「抗日戦争と中国の民主主義」『歴史評論』569。
- 水羽信男（1998）「中国革命の知識人」『広島東洋史学報』3。
- 三好章（2003）『摩擦と合作』創土社。
- 村田雄二郎（1995）『『文白』の彼方に』『思想』853。
- 村田雄二郎（2000）「20世紀システムとしての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西村成雄 [2000]。
- 安富歩・福井千衣（2003）「満洲の県流通券」『アジア経済』44-1。
- 安井三吉（1993）『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
- 安井三吉（2003）『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研文出版。
- 山田辰雄（2002）『中国近代政治史』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 湯本國穂（1992/1993）「国民党統治開始期における政治的思惟」1・2『法学論集』7-1, 3・4。
- 横山英編（1985）『中国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勁草書房。
- 横山英・曾田三郎編（1992）『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統合』溪水社。
- 横山宏章（1996）『中華民国史』三一書房。
- Workshop “1930-1940年代中国之政策過程” 事務局編（2004）『1930-1940年代中国之政策過程』。

【付記】

本稿は2003年12月に北京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で行なった報告を基にしている。聞黎明氏

はじめこの報告会の参加者から、貴重な批判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た。訳稿の作成には、金俊・王士花・丸田孝志・徐皓の各氏から支援を得た。

本稿は筆者を代表者とする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都市と権力——マス・メディアの形成との関連から」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8–1949

Nobuo MIZUHA

Major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until the end of the 1960s had been based on the presupposition of view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49,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hich led it, in a positive light. However,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scholars began to reconsider this viewpoint.

Therefore, most Japanese scholars have also revised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CCP. Furthermo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ist Party (i.e. the Guomindang) an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民主党派) has also come to arouse scholars' interest too. This new trend in research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and its fundamental theme has been the building of a nation state in China.

Why does this essay discuss articles written in 1928 or later? This is because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北伐) was almost entirely over by 1928, and from this year onwards China began its full-scale state building program. This essay surveys research trends regard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e. 1928-1949).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1.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Japanese studies ? 2. What have the results of Japanese studies been ? , and 3. What problems remain unsolved ?